

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

黄淳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

黄淳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

黄淳浩 著

责任编辑：罗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5 印张 260 千字

印数 0001—1100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654-1/I·80 定价：15.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长期以来，在所谓“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错误思潮影响下，对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创造社，人们不仅研究不够，而且还加诸了许多责难：斥之为表现自我，宣扬极端个人主义者有之；责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派，宣扬艺术至上、感伤主义、世纪末颓废思想者更有之；而攻之为极“左”，对我国“左”倾思潮之流行负有责任者也不乏其人。以致它的主帅郭沫若多少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以致有的同人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当过创造社之成员，而且至今在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不过身来。

实际上，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文坛崛起最早和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它异军突起，艰苦创业，标新立异，趋赶世界思想文化的新潮流。在1921年至1929年将近十年期间，它坚持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和巨大的，不仅为其他兄弟文学社团所不能比拟，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在文学艺术方面，它提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多元发展，并带头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仅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开创了新生面，坚挺了新文学的地位，而且壮大了新文学运动的队伍，发展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在思想理论方面，它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向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输送了精神粮食。

创造社从初期、中期到后期，曾经有三、四十个作家、艺术

家在它的旗帜下创作和战斗过。其中，著名或比较著名的，初期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陶晶孙、何畏、穆木天，中期有王独清、周全平、倪貽德、叶灵凤、潘汉年、蒋光慈、柯仲平、黄药眠，后期有李一氓、阳翰笙、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许幸之、王学文、沈西苓、龚冰庐。其中，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更是大师级的作家。他们不仅活跃在 20 年代，而且驰骋于 30、40 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理论战线，不少成了我国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乃至政界的领袖人物。他们不仅当时对我国的革命文化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还影响了一代乃至数代的作家和革命者，为新中国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立过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当然，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创造社和它的部分成员，也曾为思想理论和文学艺术中的“左”的思潮推波助澜，留有遗患。

因此，不管是对创造社这个革命文化社团也好，对曾经在“创造”的旗帜下创作或战斗过的这批作家也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成功与失误，总结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不仅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而且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目 录

前言

(一) 创造社的酝酿和成立	(1)
一、异军突起在新文化运动之中	(1)
新文艺勃兴必为自我觉醒之绝叫	(1)
“五四”促成文学革命迅急发展	(3)
“五四”落潮后新文坛处境荒凉	(4)
顺应着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	(6)
关于《回顾》之回顾	(9)
二、漫长的孕育期	(11)
博多湾畔的邂逅	(11)
三点一线的交相呼应	(13)
立意就在急挽狂澜	(16)
不忍池边的紧锣密鼓	(17)
三、仓促的成立会	(18)
机遇的偶得和赵南公的胆识	(18)
泪浪滔滔与千里迢迢	(20)
实质问题在病院中得以解决	(21)
改盛馆的成立会	(22)
创造社到底成立于几月	(25)
(二) 创造社的分期和主要活动	(30)
一、分期刍议	(30)
两种说法均始于郭沫若	(30)
其他创造社作家如是说	(32)

文学史家们这样认为	(33)
应该分为三个时期	(35)
中期活动应从何时算起	(39)
二、三足鼎立的初期创造社	(42)
《丛书》狂飚震撼新文坛	(42)
《创造》颇多惊世大文章	(43)
“笼城生活”，鼎沸时期到来	(46)
杀开血路，开辟文学新途径	(48)
“异军”为何成了孤军	(49)
与文学研究会的恩恩怨怨	(52)
和胡适关系之坏坏好好	(57)
成仿吾的直言和圆鼎的塌台	(60)
三、卷土重来的中期创造社	(69)
《洪水》创刊，创造社卷土又重来	(69)
出版史开新篇，读者作家共办出版	(73)
收回《洪水》，新创《月刊》，增编《丛书》	(75)
元老云集广州，东南合作展新貌	(78)
出版部召开理事会，创造社产生总执委	(81)
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文学的提倡	(82)
打破“主义”界限，团结各方朋友	(89)
恐吓利诱不凑效，龃龉隔阂成分裂	(91)
鲁郭联手流产，洪水时代结束	(106)
四、空谷足音的后期创造社	(109)
宏伟的计划和核心的转移	(109)
《文化批判》和《流沙》	(118)
首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122)
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28)
是小集团主义还是理论误导	(131)
读者的反响和专家的评说	(141)

(三) 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	(151)
一、创造社的文艺思想不能笼统概说	(152)
二、初期鼓励多元发展, 没有划一的“主义”	(153)
以浪漫主义为旗帜, 兼收并蓄其他文艺思潮	(153)
郭沫若的新罗曼主义文学主张	(155)
郁达夫成仿吾的响应和引申	(171)
对艺术上的不同“主义”一视同仁	(177)
“为艺术而艺术”, 不应人云亦云	(179)
三、中期写实与象征并举, 呈过渡性质	(180)
“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首次提出	(181)
象征诗和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阐发	(184)
过渡性质的呈现	(189)
四、后期独尊普罗文学, 发展路子趋窄	(189)
从属政治的文艺观取代“没有划一的主义”	(189)
良莠并存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192)
对新文学运动历史和现状的“清算”	(197)
功过是非, 教训种种	(198)
(四) 由新罗曼主义走向新写实主义	(200)
一、诗歌开一代新风	(202)
新诗坛的奠基之作《女神》	(203)
清新淡雅的成仿吾、邓均吾诗	(205)
空前的抒情长诗《瓶》	(207)
耀眼的象征诗集《旅心》《红纱灯》	(208)
王独清的《死前》和《圣母像前》	(213)
柯仲平蒋光慈黄药眠的革命诗歌	(216)
冯乃超诗风的根本转变	(220)
《恢复》的划时代成就	(221)
二、小说创一大流派	(224)
惊世骇俗的郁达夫感伤抒情小说	(225)

愤激反抗的郭沫若精神分析小说·····	(242)
品位不高的张资平恋爱通俗小说·····	(248)
短小精悍的成仿吾现代象征小说·····	(257)
别具一格的陶晶孙新浪漫派小说·····	(260)
周全平、倪貽德的写世抒情小说·····	(262)
多才多艺的叶灵凤心理描写小说·····	(271)
蒋光慈、阳翰笙的革命浪漫小说·····	(278)
来自北方的龚冰庐矿工题材小说·····	(286)
三、戏剧被推向大众·····	(293)
“五四”以来的新剧运动·····	(293)
田汉的早期剧作·····	(295)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	(302)
郑伯奇的反帝剧作·····	(306)
成仿吾、陶晶孙、张资平的戏剧创作·····	(309)
王独清的历史悲剧·····	(312)
冯乃超的讽刺喜剧·····	(317)
后记·····	(321)

(一) 创造社的酝酿和成立

一、异军突起在新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创造社是作为异军苍头突起，而崛起于中国新文坛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历史的回顾，来看看创造社是如何异军突起，脱颖而出，掀动了整个文坛的。

新文艺勃兴必为自我觉醒之绝叫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以文学革命为先声的。早在1916年8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李大钊就指出：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①

于是，《新青年》杂志在1917年元旦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刊登，3月、5月有钱玄同、刘半农支持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之书信和文章的发表。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谓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

①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后来，他又把这称做八不主义，并用肯定的语气从正面把它归结为四条主张。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①

文章基本做在作为文学表现工具的语言文字上。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据胡适自己的研究，“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所以，“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口语代替古文的革命，是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②在他看来，“旧文学的一切弊病……都可以用一个新工具扫的干干净净。”“所以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他把这视为他的“中心理论”，并称之为他的“文学工具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③。对于以古文为工具的旧文学，既然新词带有新的概念，新的形式代表着对于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和新内容的追求，所以这里对于新工具新形式的讲究，从内容上讲，仍是具有改革的意义的。

其实，白话运用于文学，在我国已有了一千年的历史，只不过当时是盲目的实行，而不是自觉地提倡，故白话文学未能取旧文学而代之。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要比胡适激进得多。他在其《文学革命论》中所主张的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及他反对韩昌黎“文犹师古”、“文

①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

② 《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历史的引子》。

③ 胡适：《〈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1935年9月3日。《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第19、22页。

以载道”，主张“赤裸裸的抒情写世”“革新文学革新政治”以便使国人“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趋势及时代之精神”^①的号召，不仅直接继承了晚清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成果，把文学革命的矛头既径直地对准了封建旧文学的形式，也牢牢地瞄住了封建旧文学的内容，而且公开倡导以欧洲的文学新潮为楷模，实在为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之所不及，颇有真正的“文学革命”之气概。

钱玄同在看到胡、陈文章后所写致陈独秀的信函（载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和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理论上虽无重大建树，但对胡、陈理论却不乏支持赞助之力，具体意见上亦多有所补充。

胡适在1918年4月曾立志“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并申言要创造“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之新文学”^②，而且也在多方面作了“尝试”，什么诗集《尝试集》呀，剧本《终身大事》呀，等等，数量不算少，但他的诗作诗味固然不浓，戏剧又兴不起什么高潮，所以即以其自己为新文学所订的标准来看，那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并未由他建立起来。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似乎还有些自知之明，1923年5月15日在致郭沫若、郁达夫的信中曾坦率地加以承认：“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③。

在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首先给人们带来振动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两篇都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后者在文学观念上给人们输进了一些新鲜东西，而前者则在创作上给新小说创下了榜样。但他们势单力薄，并未能形成一个大的冲击力量。

①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②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期。

③ 1979年5月中华书局《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第200页。

“五四”促成文学革命迅急发展

是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我国的文学革命带来了新的曙光，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更促成了文学革命运动的迅速取得胜利。胡适、刘半农等人都曾经认为，“废文言而用白话”，使白话文学取代以古文为工具的旧文学的正统地位，是一件“非一蹴可几”的事情，它们需要经过三五十年的努力，至少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对峙阶段。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仅三四年的功夫，白话即已取代言文而成了社会通行的交流工具。据有人统计，1919年以前，全国只有有数的几种报刊使用白话，而在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一下子即达四百种以上，形势发展之迅急，实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始料所未及。至1920年1月，教育部被迫宣布从当年秋季入学开始，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改用白话。此后不久，中学和大学，也相继改用白话教学。

白话报刊的增多，迅速地给新文学创造了广阔的阵地。胡适回忆说：“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①尤其是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均于1919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刊登白话文学作品，对新文学的兴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后来参加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语丝社的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在这些报刊上得以发表。

“五四”落潮后新文坛处境荒凉

但在1920年前后，新文坛却又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不是没有白话文学发表的阵地，而是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白话文学家来提供新文学作品了。这就是说，“五四”落潮后的新文坛，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景象。那种荒凉情况，在鲁迅、沈雁冰、郑伯奇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导

^① 《文学革命运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1922年3月3日。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0页。

言》中，均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鲁迅是这样说的：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①

沈雁冰则不仅讲了创作的寂寞，还谈到了创作的开始活跃：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②

郑伯奇表示赞同沈雁冰的估计，并作了些具体的描述：

这观察大致是准确的。前半期创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间中国的新文学还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多”的几个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启蒙运动者的态度。当然，“后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是在这里胚胎着。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在那里练习身手，许多文学团体已经在暗中准备队列。^③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在这里，鲁迅把新文坛寂寞冷清时间的下限划到1922年，而沈雁冰则划为1921年。实际上，从1921年的下半年起，情况已经改观。今天的新文学史家，不少人把新文学的成长期划为从1921年起，应该说是较为恰当的。因为中国文学运动中两个最大、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诞生于1921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正是因为不甘心新文坛的寂寞，才应运而生的。

顺应着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

一个文学社团的诞生，往往由于两方面的需要，即社会的需要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社也不例外。她的诞生，一个方面是顺应了“五四”以后中国现实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是因为创造社的作家认为，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当时的新文坛的现状尚不足以反映人们那种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心声。因此，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筹备，创造社终于呱呱落地。

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一文中，曾经分析到创造社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这一时代要求上的特殊之处。他说：创造社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酝酿、发起、成立起来的。他们既不像留美学生那样多属于达官富商的子弟，也不像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那样经过劳动锻炼，绝大多数是没落地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到日本留学无非利用少花钱少跑路等便利条件求得些新知识为祖国效劳，可是冷酷的现实却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和教训。这就是自从甲午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直接、最凶恶的敌人。因此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从来是最敏感最强烈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也在日本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开展起来，故而使得中国的留日学生，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又接受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受到国

内“五四”运动的触发，创造社作家们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绪很快地高涨起来。虽然“五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团体一般都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但相比之下，这种倾向表现得最鲜明、最尖锐、最强烈的，要推创造社。^①

而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情况看，我觉得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谈到的某些情况，颇值得玩味。实际上，这篇文章谈的不只是小说，也说到了诗、散文等等。可以说，它论证的是30年代以前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

沈从文首先谈到的，是文学革命的“几个在前面走一点的人”。他说：“‘五四’运动左右，思想‘解放’与‘改造’运动，因工具问题，国语文学运动随之而起。国语文学的提倡者，胡适之，陈独秀等，使用这新工具的机会，除了在论文外，是只能写一点诗的，”“‘提倡’者却不是‘制作’者，他们为我们文学应当走去的路上，画了一些图，作了一些说明，自己并不‘创作’。他们的诗是在试验上努力的，小说还没有试验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接着，他用比较的手法谈到了鲁迅、文学研究会的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落华生和创造社诸作家的不同。他说“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以概括读者的兴味，作者许可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而读者却需要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读者’。”是鲁迅改变了这种状况，所以他“意外的成功了”。但“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至于叶绍钧等人的“比一切其他作品为好”的作品，固不乏“温暖的爱”（叶绍钧）、“母性的怜悯”、“儿童的纯洁”（冰心）和“技术组织的完全”与“所写及的风光情调的特殊”（落华生）等等，

^① 1959年《文艺月报》第5、6、8、9号。

都达到了相当的高点，甚至是别人“无从企望的高点”。

而创造社的作家们呢？沈从文说：“与上列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朦胧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面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词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较之在思想方面为大的。”^①

沈从文的这些话，当然并无意于夸饰创造社的作家作品较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如何如何，但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反映当时的现实上效果是何等的不同。当然，沈从文并没有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这样的词。也许，在“五四”那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浪漫主义的确更能反映那时的革命精神和群众心声。人们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需要浪漫主义的文字表现，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求解放、盼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心声要浪漫主义的文字来表现。创造社的刊物和作品受到当时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这都说明中国的新文坛之所以会产生创造社这样一个文学团体，是有一定的现实要求和时代背景的。

也许，这正印证了李大钊在1916年所说的话，即新文艺之勃兴，必赖一、二个敢犯当世之不韪的哲人，能够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才能把中国广大群众几千年的沉梦惊破。当然，这样的哲人，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而且主要地还不在于文学方面。而且他可以不只是一、二个，他可以是几

^①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1931年4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